

智慧的探索

馮契 著



(沪)新登字第 201 号

智慧的探索

冯 契 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政编码: 200062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 上海新文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21.5 插页: 4 字数: 400千字

1994 年10月第一版

1994 年10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001—1,500 本

ISBN 7-5617-1224-3/B·069 定价: 平24.30 元
精27.30 元



作者 近 影

作者弁言

这些年来，我除了主持几项集体研究项目之外，个人研究工作主要是两项：一是哲学史研究，出版了《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和《中国近代哲学的革命进程》两种著作，对自先秦直至1949年止的中国哲学的发展轨迹作了粗线条的描绘；二是哲学理论问题的研究，对我自40年代开始便一直关心着的知识与智慧的关系问题，从广义认识论、方法论、价值论等角度作了探讨，写了《认识世界和认识自己》、《逻辑思维的辩证法》和《人的自由和真善美》三本书稿，合称为《智慧说三篇》。

我原来打算待《智慧说三篇》书稿整理完成以后，再把历年来发表的单篇文章选编成一本《智慧说外篇》以为补充。但前者的整理工作尚需时日，后者便也没有动手。今年以来，哲学系的许多同事和研究生多次敦促我提早编出文集，同时，华东师大出版社也热心支持。我难以拒绝大家的一片好意。于是就把“三篇”的整理工作暂时搁起，在青年同志帮助下，把“文革”以后

十多年来写的论文、发言稿、序跋等汇集起来，从中选出49篇，加上《智慧说三篇》的“导论”，共约30余万字，编为一集，即以“导论”的题目《智慧的探索》作为书名。

编选文章，当然得有个标准。我为自己规定的选录标准是两条：每篇文章要有自己的真切的见解，而决非人云亦云，此其一；全书以智慧学说为中心，各篇同我对知识与智慧的关系问题的探索有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此其二。所收诸篇，按写作和发表的先后次序编排，时间跨度达15年（1979至1994）。回顾这十多年来的思想历程，虽自觉基本观点具有一贯性，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在某些具体论点和看法上前后也有变化，特别是在摆脱“左”的教条的束缚方面，自觉有点长进；而对若干理论问题的探讨，也有所加深。不过，我认为不应该用今天的眼光去修改昨天的文章，只要在发表的当时是出自真诚而有亲切体会的见解，我宁愿让它保留原来的面貌，以保存历史的真实性。所以，对本书所收各篇，在内容上一概不作实质性的修改。有几篇彼此颇多重复之处，有些发言稿显得冗长、啰苏，这些缺点也没有加以纠正。只有个别文字表达不确切或引用资料有错讹（其中包括对爱因斯坦的一封信的翻译和解释，见本书第188页注释）作了订正。

哲学理论问题的探索和哲学史研究是有区别的，但两者又互相联系着。这本文集是作为《智慧说》的“外篇”来编辑的，侧重在探讨哲学理论问题，而其中许

多篇却显然是从哲学史中总结出来的。作为“外篇”，我根据《智慧说》的框架另拟了一个“分类目录”，附在后面，供读者参考。这“分类”决不能说是严格的，因为各篇内容往往互有交叉。不过我主观希望，读者从这个目录可以看到，这本集子以“智慧的探索”为中心，以“化理论为方法”（方法论）和“化理论为德性”（价值论）为其两翼，并求会通“古今”和比较“中西”而达到新的哲理境界，所以各篇之间存在着这样那样的联系，而并非散沙一盘。

本书之所以能顺利出版，要感谢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的大力支持。在编选、付印过程中，得到本校哲学系和哲学研究所许多同志的关怀和帮助，杨国荣、高瑞泉、崔宜明、郁振华、李似珍等同志承担了复印、核对资料、加注释、编索引等许多具体工作，责任编辑缪宏才同志更是化了不少时间和精力，在此对上述同志致以深切的谢意！

一九九四年七月

目 录

作者弁言	1
对历史上的哲学思想要具体分析	1
对庄子的相对主义作一点分析	7
研究辩证逻辑的途径与方法	22
中国古代辩证逻辑的诞生	33
论真、善、美	63
论真、善、美的理想	97
论王夫之的辩证逻辑思想	118
发展逻辑学和研究科学方法论	145
批判继承中国古代哲学遗产与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152
《美学基本原理》序	159
先秦儒家和道家关于人的自由和美的理	

论	164
论中国古代的科学方法和逻辑范畴	188
金岳霖先生在认识论上的贡献	214
论“以得自现实之道还治现实”	232
中国近代对方法论的探索	250
中国近代美学关于意境理论的探讨	265
黄宗羲与近代历史主义方法	281
青年梁启超的自由学说	287
《罗素哲学》跋	305
《古代基督教史》序	310
哲学要回答时代的问题	315
从书中汲取智慧	321
《价值与评价》中译本序	324
“千古不可无之同异”	
——《朱熹王守仁哲学研究》序	329
“五四”精神与哲学革命	336
《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史》序	355
关于中国近代伦理思想研究的几个问 题	362
王阳明在中国哲学史上的地位	379
儒家的理想和近代中国的自由学说	384
《王学通论——从王阳明到熊十力》序 ...	394

马克思主义美学有待于发展

——《普列汉诺夫美学思想研究》序 398

《易传》的辩证逻辑思想 404

“新理学”的理性精神 423

儒家与教育

——《儒家理想人格与中国文化》序 435

《天命的没落——中国近代唯意志论思

潮研究》序 441

《中国近代逻辑思想史论》序 446

“究天人之际”与“通古今之变” 452

智慧的民族特征

——从中国传统哲学的特点看中国传统文化 463

对数百年中西文化比较的思考

——《第一页与胚胎——明清之际的中西文化比

较》序 502

秦汉哲学的特点与民族传统 509

性善说与理想主义

——《孟子思想评析与探源》序 520

《中国古代科学方法研究》序 525

《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序 529

《佛教文化与近代中国》序 537

忆在昆明从汤用彤先生受教的日子 542

“通古今之变”与回顾二十世纪中国哲学	553
忆金岳霖先生以及他对超名言之域问题的探讨	564
《嵇康美学》序	585
《马克思恩格斯同时代的西方哲学——以问题为中心的断代哲学史》序	593
智慧的探索	
——《智慧说三篇》导论	600
附录一 分类目录	655
附录二 名词索引	659

对历史上的哲学思想要具体分析*

在中国哲学史领域拨乱反正,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克服极左路线的影响,还有许多工作要做。为什么“四人帮”能够借“评法批儒”的旗号,篡改中国哲学史来为他们阴谋篡党夺权制造舆论?这同我们还未真正运用马列主义的观点、方法来建立科学的中国哲学史有关。解放以后,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取得了很大成绩,但不能否认,极左路线对这一领域的干扰、破坏是严重的,至今还有许多条条框框束缚着我们的头脑。在这以前出版的某些著作中,由于极左思潮的影响,阶级分析成了贴标签,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成了简单的模式,这类现象显然是违背马克思主义关于“具体地分析具体情况”的要求的。我们一定要解放思想,冲破禁区,打碎这些条条框框,力求如实地对历

* 本文是作者在中国哲学史讨论会和中国哲学史学会成立大会上的发言稿(会议于1979年10月在太原市举行),原发表于《哲学研究》1979年第11期。

史上的哲学思想进行具体的分析。

这里就如何对历史上的哲学思想进行具体分析谈两点意见。

第一点，关于阶级分析。哲学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概括和总结，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哲学的源泉，我们应该以阶级斗争理论作为分析历史上哲学思想的指导线索，同时也必须考察自然科学即生产斗争知识的发展，把两者结合起来，这是研究哲学思想的历史演变的普遍根据。一个哲学家参加社会实践往往是多方面的，不只是参加阶级斗争或政治活动，他还研究科学、整理文献，或者还从事教育工作和文艺创作等。只注意政治态度而不考察科学研究等方面，就不能全面地说明哲学家的思想是怎样从社会实践中产生的。

同时，阶级分析也不能简单化。不同时代有不同的阶级矛盾，反映到意识形态领域，就有不同的政治思想斗争，正是各个时代的重大的政治思想斗争，制约着哲学斗争。例如，在先秦时期的“古今、礼法之争”，近代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古今、中西之争”，确实是制约着哲学斗争的时代中心问题。在革命的时代，阶级斗争决定哲学斗争，而哲学革命又转过来作了政治变革的前导，这种相互作用是非常明显的。但就在这样的时代，也不能忽略科学和哲学的联系。墨家、荀子的朴素唯物主义形态是同古代的自然科学密切联系着的，严

复的机械唯物论倾向和进化论思想是建立在近代西方自然科学基础上的。至于自秦汉至鸦片战争前的长时期里，农民阶级反对地主阶级的斗争表现为农民要求平等、平均的思想同封建等级观念的对立，这固然也是两种世界观的斗争，但是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农民阶级不能建立科学的哲学体系，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主要地是在地主阶级内部进行的。但是，在地主阶级内部当然不可能有反对封建主义的政治斗争，所以用地主阶级的革新派反对顽固派，或中小地主反对大地主来解释哲学斗争，是缺乏说服力的。其实，当时推动哲学前进的，首先是物质生产和自然科学的进步，如王充、范缜、王夫之等人都很关心物质生产，注意吸取当时自然科学的成就，所以在自然观和认识论上能坚持唯物主义，反对宗教神学和唯心主义。当然，由于这些哲学家大多属于地主阶级的中下层，因而对大地主阶级的统治和土地兼并有所不满，这是促使他们敢于面对现实而倾向唯物主义的一个重要条件。但这种不满通常不可能发展到反对封建主义的地步。相反，在他们身上，我们常常看到封建地主阶级立场和唯物主义思想的矛盾。政治思想斗争和科学反对迷信的斗争是推动着哲学前进的两条腿，这两条腿立在同一个基础上，两者都来源于社会实践，我们不能偏废。

第二点，关于唯心主义的评价问题。唯心主义是谬误的思想体系，是宗教的精致化，这是不容怀疑的。

但理论上错误不等于政治上一定反动。唯心主义者也有可能是当时的进步思想家，如李贽。就理论而言，哲学史上的唯心主义者，有许多人虽自夸建立体系，其实不过拾人牙慧，人云亦云而已。对于这些人，完全可以藐视。问题在于那些对哲学和民族文化的发展确曾起过重大影响的唯心主义哲学体系，我们决不可以采取粗暴态度，把它们一棍子打死。正是这些曾在一定历史条件下起重大影响的唯心主义体系，包含着人类认识的必要环节，是哲学史工作者决不能忽视的。

哲学史最集中地体现了人类认识的发展史。那末，怎样来把握作为认识史的哲学史呢？一方面，从哲学和其他科学、其他意识形态具有共同的普遍的根据来说，我们必须考察政治思想斗争和科学反对迷信的斗争如何制约着哲学的发展。另一方面，哲学发展还有其特殊的根据，自己的历史。作为社会分工的一个特定领域，每一个时代的哲学都有其先驱者传下来的思想资料作为出发点和进一步改造的前提。墨子继孔子之后而又批判了孔子，黑格尔继康德之后而又批判了康德，哲学史表现为互相对立的哲学体系更迭的历史，而这个历史归根到底是以哲学根本问题为轴心而展开的辩证运动。把上述两个方面的考察结合起来，我们就能把握哲学的历史发展的根据。哲学史可以说是根源于社会实践的主要围绕思维和存在关系问题而展开的认识的矛盾运动，而这个矛盾运动的环节就是人类认

识的必要环节。

列宁说过,人类认识世界的过程是活生生的、多方面的(方面数目永远增加着的)辩证的运动。把这辩证过程的某一环节、特征片面地夸大,把认识曲线的一个片段变成直线,都可能发展成唯心主义的哲学体系。如片面夸大经验,可以发展为经验论的唯心主义;片面夸大理性,可以发展为唯理论的唯心主义。割裂相对和绝对,割裂客观规律和主观能动性,都可以导致形而上学和唯心主义。而唯心主义既经形成体系,统治阶级就会把它巩固下来,以之作为麻痹人民的工具。用这样的观点来考察历史上有重大影响的唯心主义哲学体系,我们就可以对它们进行具体分析:既批判它们的唯心主义谬误,又揭露出其中包含着的认识的环节。这样的唯心主义体系不是没有根基的,它们是人类的活生生的认识之树上生长出来的不结实的花朵。

一个人的优点和他的缺点往往互有联系,譬如说,有才能就容易骄傲,思维敏捷就容易轻率地下结论等。一个哲学体系所包含的积极因素也往往和它的谬误互有联系。例如,孔子尊重理性,这是认识史的一个重要环节。“不语怪力乱神”,是理智的态度;他提出“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等认识论命题,也是合理的见解。但是他又以为理智的目标在“知天命”,并构造出一个唯心主义天命论的哲学体系。老子提出“反者道之动”,第一个提出否定的范畴,这是辩证法发展史

上的一个重要环节。但他的辩证法是半途而废的，他从“物极必反”的原理得出了“弱者道之用”、“保此道者不欲盈”的消极结论，并把“无为”、“无名”绝对化而导致了唯心主义。这些例子说明，对历史上有重大影响的唯心主义哲学体系，必须进行具体分析，才能扬弃它的唯心主义体系，而指明其作为认识的必要环节的意义，从而在批判中吸取其积极成果与教训。积极成果，当然是重要的。理论的教训，对我们今天提高识别能力和克服唯心主义，也具有借鉴作用。

如何具体分析历史上的哲学思想，当然还有其他方面的问题，这里就不谈了。